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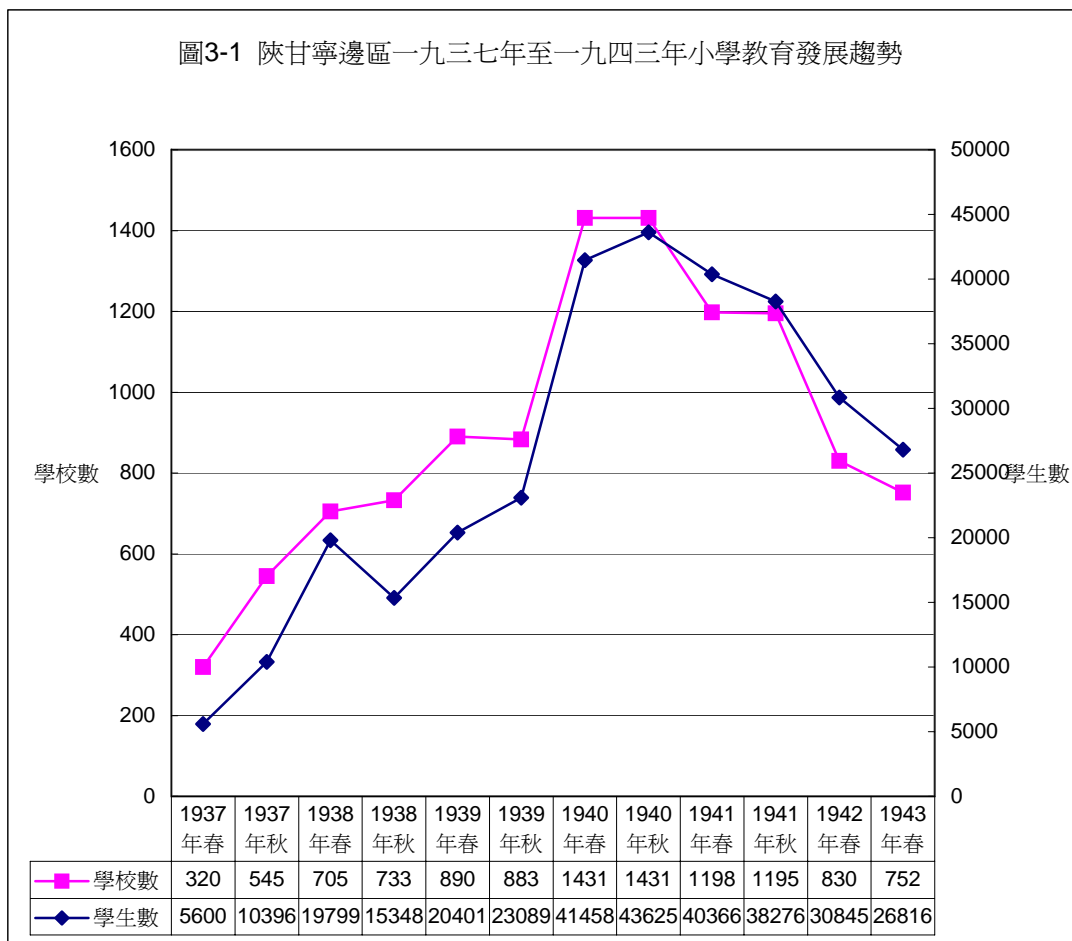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困境中的農村教育

第一節 瓶頸與衰退

從「普及教育突擊」到「改善質量」，這是從「有」到「好」的過程。藉著行政管理體系的建立和各種教育相關法令、辦法的頒發，教育廳希望讓數量上粗具規模的各種教育組織能在教育品質上達到一定水準，發揮預期的教育效果。只不過就在「提高質量」的各項措施開始一一實施之後，邊區教育成長的腳步開始明顯慢了下來。這一點在小學的發展上最為明顯。圖 3-1 顯示，一九三八年春以前小學校以半年約二百所的速度穩定增加，學生數更是呈現倍數成長。但是到了一九三八年秋，也就是在包括「正規化」在內的一連串提高質量措施開始實施之後，儘管教育廳持續要求擴大數量，學校數卻只增加不到三十所，學生數甚至出現大幅的下滑。「改善質量」與各項統計數字下滑之間關係並不難理解。從先前教育廳一連串的檢討可以知道，一九三八年春以前快速增加的學校有許多並未正常運作，有些甚至可能只是空有其名，一旦教育廳開始對於教學的品質有所要求，並且掌握了行政監督的管道，真實的情況便無所遁形，這應該是學生數的大幅減少的主因；在這種情形之下，地方政府勢必要花費許多的心力在維持、提升原有的學校，自然也就難有餘力開辦新的學校。

一九三八年秋統計數字的突然大幅下滑可以說明一連串「改善質量」措施所發揮的作用，只不過這樣的副作用並不是中共所樂見的。針對數字下滑的情形，一九三八年底教育廳加緊了擴大數量的工作，統計數字下滑的情形有了起色，一九三九年春無論學校數或是學生數都再度大幅成長，但到了該年秋天，學校數卻首次出現了負成長。表面上看來一九四〇年是邊區史上教育發展最快速的一年，學生數和學校數不僅都是歷年的最高記錄，也分別比前一年成長將近 100% 和 60%，這樣的成績成為各方史家論證陝甘寧邊區教育成就時不可或缺的範例。只不過這一年大幅成長的真正原因卻是由於加

圖3-1 陝甘寧邊區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三年小學教育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與說明：

一、一九三七年春至一九四一年春的統計來自〈陝甘寧邊區五年來教育工作概述〉，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340；一九四一年秋至一九四二年春的統計來自〈去年工作總結 今年工作計畫大綱〉，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364。

三、一九四三年統計來自江隆基，〈關於民辦公助政策的初步總結〉，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376。

入了八個原為國民政府統治的縣分統計，如果扣除了這八個縣分的數字，實際上只比前一年秋天增加二十所學校，三千多名學生。¹換言之，從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〇年春之間，小學數量的發展已經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雖然在這段期間學生數仍以半年三千人左右的速度穩定增加，但學校數成長停滯卻代表著未來的擴展空間有限，邊區教育發展的瓶頸已經隱然出現。

早在一九三九年底中共便已經對邊區教育發展的遲緩感到不耐，並且有了一連串擴展的計畫。十一月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要在一年之內動員全部學齡兒童入學，²十二月教育廳開始提出一連串以擴展數量為目標的計畫。「普及教育三年計畫草案」計畫在三年之內以「強迫教育」的方式讓所有學齡兒童入學，³「消滅文盲三年計畫草案」則打算在三年內透過各種社會教育措施，消滅至少一半的邊區文盲人口。⁴這樣氣魄十足的教育提升計畫，在一九三九年底《強迫教育暫行條例草案》和一九四〇年三月《實施普及教育暫行條例》陸續公佈後，儼然已經正式展開。《實施普及教育暫行條例》規定，除了因病或特殊原因的個案，七至十三歲的學齡兒童必需在三年之內一律入學，如果不從將由地方政府強制執行。⁵這樣的法令展現出邊區政府對於大幅提升邊區教育水準的強大企圖心，只不過根據草案估計，三年之內光是小學的部分就必需增加教員一千九百人，學校一千九百所，⁶而當時開展了三年的小學教育也不過才八百八十所學校，從當時的環境來看，這樣的企圖心實在

¹ 原邊區內的學校數為 902 所，學生數為 26911 人。見〈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1988，頁 207。國共在一九三九年以後摩擦漸多，一九四〇年二月中共驅逐了國民政府派駐綏德的行政專員何紹南，隨後將原國統區內的綏德、清澗、吳堡、慶陽、合水、鎮原、安定、富縣等八個縣納入邊區範圍，因此這些地區的各项教育數字也順理成章的納入邊區政府的統計之中，這是造成該年統計數字大幅成長的主要因素。

² 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發展邊區教育提高邊區文化的決議〉，《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 377。

³ 〈普及教育三年計畫草案〉，《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69-76。

⁴ 〈消滅文盲三年計畫〉，《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140。

⁵ 〈陝甘寧邊區實施普及教育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79-80。

⁶ 〈普及教育三年計畫草案〉，《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75。

是不切實際。「強迫教育」或是「義務教育」的計畫自清末以來便不斷的出現，但是礙於現實條件這些計畫從未普遍實施，中共在各方面條件更加落後的情形下，想在三年之內完成學齡兒童「強迫教育」，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成人掃盲計畫，無異於天方夜譚。究竟當時的中共官員是什麼想法今天已不得而知，或許是一時急昏了頭，或許只是像一九三七年的「普及教育突擊」一樣，想藉著運動所形成風氣和壓力來達到一定的提升效果，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八月中央宣傳部仍然指示邊區政府「應當頒佈強迫推行義務教育的法令」，⁷但沒有多久，政策便有了大幅的轉變。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份名為《今後學校教育總方針》的指示信中，教育廳一改先前「擴大數量」和「強迫教育」的積極態度，宣佈以後的方針將「不大量發展學校」，而是「鞏固現有的學校和學生，並提高質量」。⁸十二月，《陝甘寧邊區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頒佈，原先全面強迫入學的規定改成以區、縣為單位，在經濟負擔許可的情況下實施，實施的時程則由原先的三年放寬為六年。⁹從黨代表大會中的「一年之內」到後來分期六年，從由全面性的強制「法令」改變為有條件實施的「辦法」，義務教育的推動顯然已經趨於保守。雖然在這份辦法頒佈的同時，邊區政府也指定延安、延長、延川和固臨四縣首先實施全縣義務教育，¹⁰但日後的發展，除了《新中華報》上零星的宣傳報導之外，並沒有義務教育實施的後續消息，也沒有擴大推動的跡象，至於社會教育的三年掃盲計畫也似乎為人所遺忘。

⁷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提高陝甘寧邊區國民教育給邊區黨委及邊區政府的信〉，《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319。

⁸ 〈今後學校教育總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指示信〉，《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26。

⁹ 〈陝甘寧邊區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81-86。根據這個辦法，實施義務教育的區、縣應具備二個條件，一是三分之二以上學齡兒童的家庭經濟力能供給子女入學，二是當地能籌措實施義務教育所需經費的二分之一以上。

¹⁰ 〈陝甘寧邊區政府指令—關於延安等四縣首先實行義務教育辦法〉，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二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頁 526-527。

一九四〇年十月的政策轉折可說是邊區教育發展的分水嶺，自此以後小學教育的發展日益緊縮。一九四一年九月，第四次三科長會議召開，副廳長丁浩川提出「明年」的小學整頓辦法，規定沒有合格教師，學生未達二十五人及校舍、設備未達標準的學校將停辦或是合併。¹¹十二月，教育廳發出「提高小學質量」的指示，裁併不合格小學的工作正式展開。¹²從「質量並進」發展成爲「重質不重量」，一九四〇年以後各項統計數字呈現每況愈下的景象。包括新區在內一九四〇年整年的小學校數成長完全停止，學生數只增加二千多人，一九四一年學生數和學校數雙雙下滑，一九四二年以後更是呈現大幅的衰退，到了一九四三年只剩下 752 所學校，約爲一九四〇年的一半。社會教育的情形也差不多，雖然上述的指令都是針對小學，但社會教育的發展政策也明顯受到影響。一九四〇年教育廳發出訓令，各縣冬學如教員不足可以酌量減少，¹³而每年冬學通令必提的人數、校數規定，從一九四〇年開始也不再出現。¹⁴再從歷年統計來看，表 3-1 顯示，除去逐年下滑的識字組統計不論，夜校、半日校和冬學在一九三九年學校數減少、學生數增加；一九四〇年納入新區八縣統計之後各種學校數量大增，但冬學人數並未成比例增加，夜校、半日校學生數甚至反而減少；到了一九四一年社會教育的統計呈現了全面衰退。由於官方發表的社會教育統計只到一九四一年，加上一九四〇年的統計數字無法區分新區和舊區數字，因此實際的發展情況不如小學教育容易掌握，但從這些粗略的統計之中可以看出與小學的相同的衰退情形，顯示出邊區教育的整體趨勢。

¹¹丁浩川，〈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30。

¹²〈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指示信—關於提高小學質量的指示〉，《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教育部分(上)，頁 127-129。

¹³延川縣，〈關於減少冬學數目暨補助經費呈文〉，(1940 年 10 月 5 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 359。

¹⁴〈關於辦理冬學的聯合指示信〉，《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38-40。

表 3-1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社會教育統計表

校數、學生數 年份	識字組		半日校、夜校		冬學	
	組數	學生數	校數	學生數	校數	學生數
1937	約 9000	約 29000	366	5959	595	9882
1938	5560	39710	835	12239	728	12824
1939	3852	24107	737	20409	643	17750
1940	3580	23725	924	14539	965	21689
1941	1973	12254	917	13895	655	20911

資料來源與說明：

- 一、 一九三七年的統計資料來自呂良，〈邊區的社會教育〉，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8、10、14。由於一九三七年冬學統計歷年公佈的數據差異極大，本表是以一九三八年初發表之統計數字為據。
- 二、 其餘統計見〈陝甘寧邊區五年來教育工作概述〉，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340-342。

一九三七年以來邊區政府推展教育的熱情是無庸置疑的，從當時各項數據來看，學齡兒童入學率約為 26%，社會教育十四至四十歲間人口入學率不到 6%，群眾教育也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¹⁵在這樣的背景下邊區教育暴起暴落的奇特現象引起了許多討論，一般認為「正規化」是當中轉折的關鍵。無論大陸或是西方學者都認為「正規化」是以西方國家或中國近代以來城市建立的教育制度為範本，以達成先進水準的教育品質為目標，因此打從一開始

¹⁵據估一九三九年邊區學齡兒童約有十萬人，小學生約為二萬六千人，入學率僅 26%；十四歲至四十歲的文盲約有三十六萬人，該年冬學學生約為二萬人，入學率不及 6%。以上數據分別見〈普及教育三年計畫〉，《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69 及〈消滅文盲三年計畫草案〉，《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142。。

便對邊區教育有著過高的期待和要求，不僅課程設計不符邊區環境需要，學校設備和學校人數的要求也顯然不切實際。「正規化」經過一段時間推動，提高教育品質的努力因邊區困難的條件遇到挫折，「質量」的迷思因此促成了犧牲數量以換取質量的策略，無法達到標準的學校被迫關閉，有限的資源被集中運用，原先的「普及教育」最後成為專為少數人而設的「精英教育」。¹⁶

「正規化」造成邊區教育的衰退，這樣的看法其實是一九四四年中共本身檢討所得到的結論，¹⁷這個結論似乎也自此成為定論。「正規化」以「改進質量」為訴求，而邊區政府歷年政策的演變，從「擴大(數量)與改進(質量)」、「鞏固數量，提高質量」到「減少數量、提高質量」，似乎證明了「正規化」的影響力，只不過用「正規化」來概括解釋邊區教育發展並不十分適當。從歷年的各種官方文件來看，「正規化」一直是針對小學教育的措施，社會教育並未包括在內。從過去學者的文章中也可以發現，有關邊區教育發展的討論一直停留在小學上，社會教育的發展變化明顯被忽略。「正規化」或許解釋了小學教育衰退的情形，但學者們顯然沒有注意、也沒能解釋社會教育同步衰退的情形。

如果將「正規化」一詞概念化，當作邊區教育發展的整體觀念趨勢，將當時邊區教育廳建立行政管理制度、頒佈各種法令辦法和改善質量等諸多措施概括在這個趨勢之中，這樣對邊區教育整體發展演變的解釋會週延一些，也才能解釋社會教育同步衰退的情形，但這樣依然很難說明邊區教育大起大落的發展。在學者們眼中「正規化」是「重質不重量」的迷思，是造成邊區教育發展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正規化」並非從一開始便是「重質不重量」。一九三八年「正規化」開始之時，「改善質量」和「擴大數量」是同時進行的。表面看來，一九三八年秋學生數大幅下降似乎證明了學者們對「正規化」「重質不重量」的批評，但實際的情形是過去浮報的各項統計在行政管理的監督

¹⁶關於各方學者對於「正規化」的評論，在本文緒論前人研究中有較詳細的歸納，在此不多加贅述。

¹⁷關於邊區政府對於「正規化」的檢討，一九四四年十月邊區文教大會前後有許多的文章發表，其中較具代表性是〈根據地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解放日報》，1944年4月29日。

措施之下現出了原形，因此與其說是當時統計數字下降，倒不如說是過去快速成長只是假象，統計數字的下降不過是反映實際的情形罷了。一九三九年春，各項數字再度大幅成長，這點可以說明「正規化」與「重質不重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一九三九年底的義務教育計畫和成人掃盲計畫也可以說明「普及教育」依然是邊區政府心目中的理想。雖然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有發展停滯的現象，但這也只能說是邊區條件限制了教育發展的速度，普及教育的推動遇到瓶頸，無法解釋後來發生的大幅衰退。

真正造成邊區教育發展衰退的關鍵其實是一九四〇年十月以後「鞏固數量，提高質量」和「裁併學校數量，提高質量」的指示，但究竟為什麼「正規化」的方向會在這個時候大幅改變？過去學者們並未對這個轉折過程多加討論，似乎認為在「重質不重量」觀念之下，一旦質量的改善無法突破，減少數量以成就質量是必然的發展。這樣的看法顯然是忽略了客觀環境變化的影響。眾所皆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間正是抗日戰爭以來陝甘寧邊區形勢最險惡的一段時間。一九三九年國共再度交惡，「摩擦」日增，國民政府加強對邊區的經濟封鎖，並在一九四〇年十月斷絕對邊區政府的財政支援；一九四〇年秋冬，中共發動百團大戰，一九四一年以後吸引了日軍的集中攻勢和包圍。在國民政府和日軍兩面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下，中共一方面外援斷絕，歲入頓時短少了八成以上，各項物資短缺，物價騰飛；另一方面，根據地大幅收縮，又從前方撤回大批部隊、工作人員，大幅加重了邊區的經濟負擔，於是財政收支失衡，赤字連年，邊區陷入抗日戰爭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困境中。在這種情況之下，救國公糧徵收連年倍增，從一九三九年的五萬石，到一九四一年達到邊區史上最高的二十萬石，造成民怨沸騰；為了減少開支，邊區政府將機關、軍隊人員各項生活供給降到最低標準，並從一九四〇年底開始要求各機關部隊節約開支，生產自給，負擔公糧之外的所有費用；一九四一年底又推動「精兵簡政」，試圖降低脫產人員數目，但這些措施依然無法填補鉅大的財政缺口，以致於後來必需甘冒道德上的大不韙開始產銷鴉

片。¹⁸

一九四一年以後的經濟困境對於邊區發展的影響是全面性的，邊區政府從上到下，從政府機關到一般百姓都只能求生計溫飽，在這個時候緊縮教育、減少非必要支出似乎是合理的處置，但過去學者並不如此認為。Peter J. Seybolt 雖然認為邊區客觀條件的困難限制了群眾教育的發展，但仍然認為「正規化」才是造成一九四二年以後邊區群眾教育「幾近崩潰」的主要原因。¹⁹ Suzanne Pepper 提到，雖然一九四二年裁併學校政策開始執行之時也正是中共經濟狀況最惡劣的時刻，但官方文件中並不曾將經濟因素當成裁併學校的理由，²⁰言下之意似乎認為，政策轉折與客觀環境的變化無關。但如果對照邊區客觀形勢發展和教育方針演變，兩者之間確有許多契合的地方：一九四〇年十月，來自國民政府的援助中止，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教育廳將原先「擴大(數量)與改進(質量)」的方針一變成爲「鞏固數量，提高質量」；²¹同樣在這個時間，九月時教育廳仍然宣佈補助各縣完全小學、民教館和課本書報等費用，但是到了十二月教育廳的態度便有了轉變，要求地方教育經費包括課本在內的一切費用均由縣內自籌；²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第一次「精兵簡政」的指示下達，²³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廳便發出「提高小學質量」的指示信，要求各地著手裁併不合格小學，兩件事之間的關係應該不只是偶然而已。

過去學者都相信中共官方的說法：裁併小學的目的是爲了「集中力量」、「提高質量」。但從以下的兩個例子可看出，裁併小學的目的並非真是要「提

¹⁸有關中共這一段時間的經濟困境和產銷鴉片過程，參閱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新史學》，1卷4期，1990年12月，頁41-111。

¹⁹Peter J. Seybolt, "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48(Oct.-Dec. 1971), p.650.

²⁰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5.

²¹柯伯年，〈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下)，頁252。

²²星光、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31。

²³〈陝甘寧邊區政府爲實行精兵簡政給各縣的指示信〉，《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四輯，頁321-322。

高質量」。首先，比較歷年教育經費支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間陝甘寧邊區的教育經費分別佔該年財政支出 8.9%、12.2%及 10%，到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只剩下 2.9%及 2%。²⁴如果說「裁減數量」真是要「集中力量」、「提高質量」，那麼實在很難解釋教育經費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其次，一九四二年一月，也就是開始裁減小學之後，《解放日報》上出現了一篇名為《提高邊區國民教育》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一方面要求整理合格小學，強調「重質不重量」的教育方針，一方面又提出鼓勵私人、教會社團或鄰里宗族興辦學校或私塾，以「補救政府力量之不及」。²⁵在中共教育官員眼中，私塾以「舊書」為教材，以背誦、朗讀為教學法，以打罵為管理學生的方式，是「封建教育」的落後象徵，也是需要「改造」甚至「淘汰」的教育方式。²⁶如今裁掉效果不彰的不合格小學，卻鼓勵「封建落後」的私塾，與「提高質量」的說法顯然有所矛盾。

第二節 農村教育的困境

一九四一年的經濟困境是邊區發展過程的重大事件，也是 Mark Selden 口中延安道路(The Yenan Way)產生的背景，無論對當時或後來的中共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但究竟這樣的一件事是否同樣對邊區教育產生影響？前面提到的幾個例子似乎可以看到經濟條件改變和教育方針轉向之間的關聯，不過正如 Suzanne Pepper 所言，在所有中共官方相關教育文件中，完全未提到經濟因素的影響，而過去學者們也不認為客觀條件的改變是造成邊區教育衰退的主因。Michael Lindsay 曾說過，陝甘寧邊區人力和物質上的困難對於需要專門師資和大量圖書設備的中、高等教育的影響較大，但對於僅需要簡單師資

²⁴ 星光、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頁 131、296、487。

²⁵ 〈提高邊區國民教育〉，《解放日報》，1942 年 1 月 14 日。

²⁶ 〈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43。

和設備的群眾教育並不致造成太大影響。²⁷或許是這樣的看法讓學者們忽略了經濟因素對教育政策的影響，但如果更深入的了解邊區教育的實際狀況便會發現，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影響遠比學者們所想像的要大得多，而在邊區以農村為主的環境中，大規模教育也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為了對邊區教育有進一步了解，也為了更確定邊區教育發展的轉折因素，以下將從幾個面相來了解陝甘寧邊區教育的實際情形。

一、 經費籌措

由於政府財政的困難，大規模群眾教育所需的經費自清末以來便是普及教育的一大難題，這點在陝甘寧邊區也不例外。與過去的作法相同，打從一開始陝甘寧邊區群眾教育經費便是希望由地方民眾自行解決，小學如此，社會教育亦是如此，因此教育廳官員在一九三八年時曾得意的宣稱：擴大教育不但不用增加教育經費，甚至於還能減少教育經費。²⁸顧慮到地方動員能力和民眾負擔，一開始教育廳對動員有困難、「萬分不足」的縣分仍然會給予一部分的經費補助，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後由於財政的困難，中央對地方的教育經費補助便完全中止。中央不再補助，各項經費規定由各縣「自籌」，但究竟該如何「自籌」？一九三八年以前的經費來源一向是以「發動群眾解決」一句話帶過，教育廳並未對這個問題多加討論或指示，如何「發動」，如何「解決」，似乎是放手由各縣去想辦法。一九三八年八月「正規化」開始，為了讓經費的籌劃有一套常規的作法，避免各縣向群眾胡亂收費造成不必要的民怨和負擔，教育廳在三科長會議上提出了一套以公產學田為經費來源的辦法。根據教育廳的規劃，學田的來源有二，一是由當地群眾全部或一部分人提供，另一種則是要各縣發動教員、學生家長和群眾去清查包括公社、寺、庵或舊有學田學款、原有的官地、豪紳地主的山地等，清查之後由縣政府將這些土

²⁷Michael Lindsay, *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 1941-47*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0), p.49。

²⁸柯伯年，〈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下)，頁 252。

地登記撥給學校，成爲教育公產，再由教員發動學生、家長耕種，或出租收取租金來作爲經費基金。²⁹一九三九年八月教育廳再度公佈一套經費籌措辦法，經費的來源擴大爲四個項目，除了原先提到的學田教產之外，還包括買賣婚姻、賭博和纏足的沒收款和罰款及學校自行生產的收益，如果上述幾項收入仍然無法滿足經費所需，最後一個方案是則向群眾募捐。³⁰

從教育廳的規畫來看，學田是解決經費的第一選擇，但是從實際的例子來看，學田的徵集並不順利，許多地方似乎從來不曾有過學田。一九四一年延長縣工作報告「本縣尚無教育公產基金」，教育經費只能向群眾募捐；³¹一九四二年靖邊縣在面對教育廳以公產基金籌措經費的指令時報告「歷年公產均無調查統計」。³²有些地方募集到了學田，也有公產收入，但似乎並未用在教育上，以安塞爲例，一九三八年十月《新中華報》上報導，該縣共徵集了學田 949 畝，³³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時，該縣所需的教育經費除了一部分來自鹽稅和斗佣³⁴外，全靠募捐而來。³⁵學田公產收入無著，各項沒收款、罰款和學校生產在各種經費籌措的報告中也幾乎不見。學校生產一開始似乎還頗有成績，教育廳的報告，一九三八年全邊區教員共種糧 5549.8 畝，種菜 265.1 畝，³⁶一九三九年也規定教員每人要開墾荒地三畝，³⁷但到了一九四〇年，教育廳卻取消了小學的穀米生產。³⁸取消小學糧食生產活動的原因不明，可能

²⁹邊區教育廳〈各縣三科長第二次聯席會議關於經費問題的決議〉，(1938 年 6 月 24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477。

³⁰〈陝甘寧邊區各縣教育經費籌措暫行辦法〉，《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76-77。

³¹延長縣，〈一九四一年上學期教育工作報告〉，(1941 年 8 月 20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6。

³²靖邊縣，〈關於本縣教育經費籌措情形的報告〉，(1942 年 8 月 7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481。

³³〈安塞縣半年來國防教育的成績(二月到八月)〉，《新中華報》，1938 年 10 月 25 日。

³⁴「斗佣」是糧食買賣的手續費，依照糧食過斗數量向賣主徵收一定比例的費用。見星光、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頁 124。

³⁵〈安塞教育〉，《解放日報》，1942 年 7 月 11 日。

³⁶〈一年來教育工作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65。

³⁷〈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小學教育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46。

³⁸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年 12 月 28 日)，《陝甘

是擔心小學生產活動影響正常教育活動，也可能是擔心教員負擔過重，無論如何，儘管各方報告中偶有提及學校生產活動，但從各地方歷年的經費籌措情形來看，學校生產的收入並不在列，這一方面的經費來源顯然也是落空的。

學田公產、罰款、學校生產都沒有著落，募捐便成了最普遍的解決方式，這也意味著民眾必需在每年例行的各項稅捐、勞役之外額外負擔一筆「教育捐」。一般來說，群眾教育所需的經費可分為兩大項，第一項是送繳縣上的經費，這一部分是用來維持縣內教育運作，例如完小經費、課本費及人員訓練等支出；第二項則是地方學校所需經費，包括成立學校所需的校舍、設備費用，支付教員糧食供給和生活津貼，及學校日常運作所需的辦公費，這一部分的經費大都是採當地動員，就地解決的方式。關於前一項費用，一開始各地教育經費收取方式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經費收支沒有計畫，徵集程序和方式也十分紊亂，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教育廳規定各縣必需提出年度預算，向教育廳提出應募經費數量，經批准後再向下分配徵集，徵收的教育經費則交由縣政府統籌統支。³⁹到了一九四二年，有鑑於各地徵收各項經費的名目眾多，徵收的時間和方式又不一致，對人民造成困擾，因此邊區政府再規定，各縣經費一律在繳納救國公糧時附加徵收。⁴⁰

有了具體規定，附加糧成了一年一度的事，不過第二項費用的徵集就顯得麻煩許多。在上述三項就地解決的費用中，校舍、設備在學校成立之初由當地「熱心人士」捐贈，或是由民眾集體捐工而來，其它則是屬於經常性的支出。經常性支出經費來源，教員糧食一般由學生家庭負責，爲了避免學生家庭負擔過重，教員的生活津貼和學校辦公費則是由其它民眾分攤。從一些零星的報告可看到，教育經費在向下分配之後，各地方的負擔並不算多。《解放日報》在一九四二年有一份關於農村動員和負擔調查報告，當中提到了清澗縣石泰鄉的例子，在某次教員米糧動員每一行政村分配到的數量是二斗

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³⁹邊區教育廳，〈陝甘寧邊區縣教育經費管理暫行辦法〉，(1939年8月1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2。

⁴⁰星光、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稿》，頁 268。

多，冬學經費則是三元。⁴¹又如一九四〇年延川縣的冬學經費，規定分配各區三分之一戶數繳交，每戶平均只需繳一至二毛；⁴²一九四二年延長縣教育糧收二百二十石，與該年該縣九千石的救國公糧來比較顯然是微不足道。⁴³不過考慮到這些數目只是眾多教育經費動員中的一次，教育經費之外又有許多雜稅、附加糧和力役負擔，累積造成的沉重壓力自然不可小覷。以上面提到的石泰鄉為例，該年到八月為止該鄉共有財物動員三十一次，當中教育經費的動員，包括教員糧食、辦公費和冬學經費便佔了五次。在過去，當邊區還是輕徭薄賦的時候，這些教育支出或許不致於造成太大的負擔，但在一九四一年以後，救國公糧大增，各種力役徵調頻繁，任何增加的負擔都變得敏感。一份延長縣一九四二年的報告中就指出，許多家長跑到鄉政府去陳情，要求緩學半年，因為學生家庭生活困難，根本無力負擔上學費用。報告中舉了兩個學校為例，兩個學校共學生三十八人，只剩一人可以上學。無法上學的三十七人中，有十三人是為了逃避本地的稅負因此逃往別地，有十人是因為生活困難，至於其他學生，有的以生病或轉學為藉口，有的原因不明，事實上都是為了逃避上學的負擔。⁴⁴

二、 校舍與設備

對中共而言，教育經費由群眾解決是無可如何的選擇，但是在邊區先天不良的條件和戰時環境下，增加群眾負擔所可能造成的副作用卻不可不慎。表面上看來，中共教育的熱情在邊區惡劣環境條件之下顯得十分不協調，但

⁴¹洪彥霖，〈動員工作與群眾負擔問題〉，《解放日報》，1942年8月21日。

⁴²延川縣，〈冬學工作初步檢查總結報告〉，(1940年12月8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59。

⁴³一九四二年延長縣徵收教育糧數見，延長縣，〈一九四二年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年2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175；該年徵收之公糧數見〈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公糧分配及夏徵麥子數應速即遵照布置的命令〉，《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六輯，頁257。

⁴⁴延長縣，〈一九四二上年上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日期不詳)，《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7。

實際上中共並沒有脫離現實，打從一開始便是希望以最低的標準來實現「普及教育」的理想，這一點在學校校舍和設備的要求上最為明顯。教育廳官員明白指出，在困難環境中發展大規模教育唯一方式便是：創設更多的學校，設備不求其完備。⁴⁵在這樣的原則之下，教育廳對於硬體設備並沒有嚴格的要求。以小學為例，教育廳雖然對「模範小學」有黑板、桌椅、操場等必要設備的規定，⁴⁶但對一般小學除了規定建築要「樸質堅固」外，其它幾乎別無硬性要求，⁴⁷地方上對於小學校的校舍、設備也就儘可能因陋就簡。

陝甘寧邊區一般小學設備狀況可以從一份教育廳輔導團的巡視報告中一窺大概。這份在一九四〇年底的延長縣巡視報告中指出，大多數小學校舍是挖窯洞而成，少數為平房；大的學校有三、四孔窯洞，但許多只有一孔窯洞；有操場的學校很少，部分學校是借用民家院子；大多數學校沒有廁所，即使是設施比較完善的完全小學也只有女廁而沒有男廁；在設備上，有桌無凳、有凳無桌，甚至桌凳全無的情況十分常見，多數學校只有一、二套桌凳；由於大多是從民家或寺廟中徵借，因此無論形式或大小都不一。⁴⁸一九四一年底教育廳曾對延屬分區五個縣共二百一十一個小學作過統計，有一半以上的學校校舍只有一孔或兩孔窯洞，有三成學校的教室沒有黑板，有一成以上的學校沒有椅子或桌子。⁴⁹由於桌椅缺乏嚴重，以致於有些地方處罰家長不送子女入學時，以罰桌椅來代替罰款。⁵⁰一九四一年底「提高小學質量」的指示發下時曾將學校有無黑板、足夠桌椅、教室、宿舍列為小學裁併與否

⁴⁵ 柯伯年，〈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下)，頁 252。

⁴⁶ 〈陝甘寧邊區模範小學暫行條例〉，《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312。

⁴⁷ 〈陝甘寧邊區小學規程〉，《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58、100。《小學規程》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公佈，一九四一年二月重新修訂，但有關設備方面的要求並沒有改變。

⁴⁸ 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年12月28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⁴⁹ 〈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27。

⁵⁰ 關於罰桌椅一事，見延長縣，〈呈送兩年來的教育工作報告〉，(1942年5月2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9；及延長縣，〈半年教育工作報告〉，(1940年7月2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5。

的標準之一，但也指示如果師資、學生數能達到標準，設備缺乏並不構成裁併的要件。⁵¹從實際的情況來看，一份一九四二年的延長縣巡視報告指出，在該次巡視所看到的八個小學中，三個有桌凳教室，一個有桌凳無教室，四個既無桌凳也無教室。⁵²校舍和設備顯然並未有任何的改善。

在社會教育方面，夜校和半日校以小學附設為主，識字班或識字組可以隨時隨地教學，不過冬學的設備就必需要另作考量。清末以來的經驗都是將民眾學校附設於小學之中，與小學共用設備和師資，冬學最初的構想似乎也是如此。⁵³不過在中共的特殊設計之下，冬學已經與過去的業餘成人教育性質不同，類似正規的學制很難與小學共存。一般來說，冬學運動在每年十一月中旬至次年一月底之間，小學的秋季學期則是從八月下旬到次年的一月中旬，兩者約有二個月的時間重疊；⁵⁴由於小學和冬學都是全時的教育組織，理論上學生必需整個學期全日在校，因此如果小學附設冬學的話兩者在這二個月期間勢必要同時上課。如果有足夠的師資或校舍的話，小學中附設冬學也許並不是問題，但當時多數小學都僅有一名教員，⁵⁵一兩孔窯洞，要應付小學不同年級的「複式教學」已經相當吃力，有些學校還要附設半日校和夜校，如果再加入冬學課程自然是困難重重，因此從一九三八年以後，除非是校舍、

⁵¹〈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指示信—關於提高小學質量的指示〉，《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128。

⁵²延長縣，〈一九四二年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 年 2 月 12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75。

⁵³早期的文件中對於冬學的設備和師資並未特別說明，但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公佈的《關於群眾的文化教育建設草案》提到冬學師資由小學教師兼任，因此最早的規畫中冬學應是循夜校、半日校模式與小學共用師資和設備。見《新中華報》，1937 年 4 月 29 日。

⁵⁴綏德分區，〈分區小學教員服務領薪及獎懲暫行簡則〉，(1942 年 8 月 10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249。根據文件中一份一九四二年的學校曆顯示，該年的小學第二學期在八月二十日開學，於次年一月十五日結束；冬學則是在十一月十五日開學，次年一月二十五日結束。每年各地冬學確切的開學和結束日期略有變動，但差異並不太。

⁵⁵以一九四〇年為例，不計該年甫從國民政府納入的綏德等八縣，全邊區的小學校數為 902 所，而小學教員只有 1114 人，顯見多數學校都只有教員一人。見〈邊區教育現狀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07、111。

師資無法解決，教育廳並不希望由小學附設冬學，⁵⁶冬學獨立設校漸漸成了主要形式。

在無法與小學相容的情形下，尋找冬學校址以及設備的籌備便成了每年十月開學之前必要的例行工作。小學是常設性質的學校，有獨立的校舍和設施，而冬學是季節性的學校，校舍和設備大都在冬學運動開展之前才臨時徵集。歷來各種報告或通令之中絕少提及冬學校舍和設備的問題，實際情形不得而知，不過從冬學教員訓練班的情況或許可以一窺大概。一般各地冬學在開辦之前會先召集冬學教員集中訓練，而一九四一年的冬學爲了該年大規模推展的新文字冬學特別在各地開辦了爲期三個月的新文字訓練班。在一份關於綏德新文字教員訓練班的報告中可知，該訓練班既無教室也無桌子，幾乎全是露天上課。⁵⁷在邊區各地中，綏德算是經濟條件最佳的地區，新文字訓練班由縣政府舉辦，教育廳派員指導，新文字運動又是當時被寄予厚望社會教育措施，連這樣的訓練班都如此克難，一般地方冬學的情形也就可見一般。

在邊區官員眼中，物質的缺乏並不會影響正常的教學活動，「香火計時，沙盤寫字，石塊爲桌椅，粘土爲粉筆」，⁵⁸這些方式都能解決物質設備不足的問題，也是邊區官員所津津樂道的克難精神，不過問題並非如此單純。邊區地廣人稀，無論是小學或冬學，許多離校過遠的學生必需住校，因此學校不單是教學的場所，也要提供學生生活所需。在缺乏足夠校舍的情況之下，許多學校是教室、寢室和廚房同在一個窯洞，一邊上課，一邊還要作飯，於是教室裏「柴草亂堆、雜木橫陳、牆壁污黑、垃圾滿地」。⁵⁹到了冬季，氣候寒冷，日照短暫，缺紙糊窗、缺燈油照明、缺碳火取暖是一般學校的寫照。依

⁵⁶劉瑞棻，〈陝甘寧邊區的冬學運動〉，《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147。教育廳在一九三八年的冬學通令中規定，附設在小學中的冬學不得超過總數的一半。見《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通令--關於冬學問題》，《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上)，頁 42。

⁵⁷綏德新訓班，〈工作總結報告〉，(?年 11 月 10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407。

⁵⁸〈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小學教育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48。

⁵⁹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年 12 月 28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照規定，離家上學的學生必需自行準備包括米、菜、油、鹽、柴火、被褥在內的各種民生必需品，但實際上農村學生家貧，所帶的糧食往往不足，有些人在家與家人共用被子，在學校竟無被子可蓋。⁶⁰這樣艱苦的學校生活環境不但是對學生、教員教學熱情的極大的試煉，其實也是邊區教育推展的一大阻力。

三、 教材供應

物質缺乏所造成的不便或許可以用學習熱情和克難精神來彌補，不過教材缺乏便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大問題。幾個例子可以顯示教科書缺乏嚴重的情形。第一個例子在延長縣，該縣縣長在一九三八年底向教育廳報告冬學和小學各缺課本五百本，要求教育廳儘速發下。⁶¹據統計，延長縣該年冬學人數不過五百人，小學生人數到一九三九年初也不過六百五十人，⁶²幾乎是有多少學生便缺多少課本。第二例子是安定縣，該縣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報告課本嚴重短缺，全縣只有三冊常識，「尤其是算術，六十九個學校裏，一本也沒有。」⁶³第三個例子在延安縣，據《解放日報》的報導，該縣在一九四一年下學期開學時，一千八百名學生中有一千名因缺課本而無法上課。⁶⁴第四個例子同樣是一九四一年下學期，延長縣的報告：「二、四、六冊國語幾乎見不到，政

⁶⁰有關學校生活情形的描述來源相當零散，比較重要的有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年12月28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162；及延長縣，〈一九四二年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年2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175。

⁶¹白世杰，〈延長縣政府關於該縣小學和冬學課本缺乏給教育廳秘書處的函〉，(1938年12月1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3。

⁶²冬學人數與小學人數分別見，〈冬學初步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上)，頁129；及〈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指示—改進與擴大小學工作的初次總檢查〉，《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42。

⁶³〈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211。

⁶⁴〈延安縣教育〉，《解放日報》，1941年9月11日。

治常識難得見到。」⁶⁵以上所提只不過是當中有具體的數字或事實，較能確實了解教科書缺乏情況的例子，事實上反應教科書缺乏的聲音在各種報告中不斷的出現，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教科書的缺乏是邊區的普遍現象。

據邊區政府的檢討，教科書缺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學校擴充速度太快，二是紙張來源困難，⁶⁶但除此之外，教科書編製缺乏規畫也是問題。邊區從一九三七年秋開始編製各類教科書，到一九四一年以前共編有小學和社會教育課本共二十九種，六十四冊。有限的人力要編出這麼多的教科書，因此編製和出版的過程拖了相當長的時間。以小學的教科書為例，第一套國語課本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但第一套常識課本卻到一九三九年初才編成，而且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春為止，除了高小的國語、歷史，初小的國語、常識有成套教材外，其它課目幾乎都尚未編完，以致於有些教科書已經改版不用，有些教科書卻還未編成。⁶⁷依照原先的規畫，各種教科書都應該人手一冊，但因為有些教科書遲遲未編成，加上紙張缺乏，光是國語、常識課本便已經供應不及，因此最後教育廳修正了教科書出版的策略，將課本的印製重心放在小學國語課本和成人識字課本上，常識課本只發給教員當作教學參考用書，至於其它科目的課本，除了數量較少的高級小學課本外，並未大量印行。

教科書缺乏，各地學校只能夠各自想辦法解決。從各種報告看來，算術、美術、唱歌、體育等課程大多數學校很少進行，至於國語和常識由於是邊區政府要求的重心，因此各地學校大多會想盡辦法勉力進行，於是四、五個共讀一本，先生寫、學生抄，越冊、重念，「有什麼唸什麼」，連一向被禁止的「封建教材」《三字經》、《四書》，甚至是國民政府所編的《復興課本》，都被

⁶⁵延安縣，〈一九四一年下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2年3月9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6。

⁶⁶〈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211。

⁶⁷見邊區教育廳，〈關於十一月份報告提出意見給延長縣白世杰同志的指示信〉，(1939年1月15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3；及〈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211。

拿來當成教材。⁶⁸在完全沒有課本的情況下，最常見的解決方法便是利用當時邊區發行的報紙來代替。比起教科書，每日出刊的報紙取得相對容易，文字可提供識字的材料，內容又可以用來當作常識課教材，雖然無法顧及學生程度和教材的連貫性，在教科書缺乏的情況下倒也不失為理想的替代品。不過即便是這樣的替代品似乎也不保證拿得到。一九四〇年初安定縣長向教育廳抱怨，該縣只分配到《新中華報》十四份，要分配給縣內三十八處學校和區、縣政府機關根本不夠。⁶⁹一九四二年教育廳輔導團在延長縣視察也發現，該縣除了在中心小學有一份解放日報外，其餘小學沒有任何報紙。⁷⁰安定縣和延長縣都是所謂的「直屬縣」，接近邊區政府所在的核心區域，如果報紙在這些縣分如此的缺乏，其它地方的情況也就不難想像。

四、 教員與地方教育幹部

教科書、教材的缺乏或許可以靠教員的努力來彌補，不過邊區的師資水準卻只讓問題更加嚴重。邊區文化水準不高是眾所皆知的事，師資的缺乏與此有極大的關係，不過邊區的師資培育顯然也有問題。一開始中共對於培養小學師資似乎並不是十分積極。邊區第一所師範學校是一九三七年二月成立的「魯迅師範」，隔了一年半後才有第二所培育師資的「邊區中學」成立。⁷¹在這期間兩校的招生情形呈現斷斷續續的不穩定狀態，一九三九年兩校合併成爲「邊區師範」(又稱「第一師範」)，成爲當時邊區唯一的師資培育機構，

⁶⁸相關資料較重要的有〈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1；〈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27。

⁶⁹定邊縣，〈關於識字組檢閱經過小學放假及假內工作佈置的報告〉，(1940年2月3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35。內容顯示該報告實爲安定縣所呈送，檔案記錄顯然有誤。

⁷⁰延長縣，〈一九四二年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年2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75。

⁷¹邊區中學雖名爲「中學」，但創立的目的卻是培養小學師資和中級文化幹部。見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二卷，頁 324。

但學生人數卻從過去的二、三百人減少為一百五十人。邊區的師範教育在一九四〇年前後開始有較大的進展，一方面是爲了即將展開的義務教育新設「關中師範」(又稱第二師範)和「三邊師範」(又稱第三師範)，一方面則是接收了原國民黨統治區下的「綏德師範」和「隴東中學」，培養小學師資的學校在一年之內由一所增加爲五所，師範生人數也在一九四一年春達到近千人，這是邊區師範教育最興盛時候。從歷年的統計來看，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以前，邊區曾經接受過師範訓練的學生保守估計有二千人以上，⁷²按理說師資應當相當充分，但實際上卻不是如此。表 2-4 是一九四一年教育廳對於邊區小學教員學歷的調查統計，根據這一份調查當時全邊區共有小學教員一千二百八十四名，但出自邊區師範體系的卻只有一百九十六人，約佔全部教員人數的 15.1%。開展了四年的師範教育竟然只培養了不到二百個教員，究竟邊區的師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表 2-4 陝甘寧邊區一九四一年小學教員學歷統計

學歷	舊制師範、中學	邊區師範或中學	高小	初小	私塾冬學	合計
人數	160	196	740	88	100	1284
百分比	12.4%	15.3%	57.6%	6.9%	7.8%	100%

資料來源：〈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28。

一九四〇年以前師範學校普遍都有學校運作不正常的現象。以「邊區師範」及其前身「魯迅師範」爲例，從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之間，在延安、延長、新正、安塞之間換過七個校址，歷經六次搬遷；一九三九年底

⁷² 〈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14。在這份統計表中雖然有各校每個學期的學生人數統計，但難以確知歷年究竟有多少人畢業。如以在校半年來算，則接受過師範訓練的人數約在三千人左右；如果以在校一年來算，則人數約有二千人。

成立的關中師範也因為「反摩擦」而三易校址、四次搬家。流徙的過程中學生流動頻繁，課程不固定，多數時間都在作群眾工作，⁷³這或許是師資培育效果不佳的原因。一九四〇年以後師資培育工作顯得較穩定，學校、學生也都大幅增加，但是卻有緩不濟急的現象。在過去，魯迅師範的學生訓練期限規定為半年，實際上大部分是三四個月便分配出去工作，但一九四〇年以後各學校在「正規化」的風潮下，將學習期間延長為一年，程度差、無法畢業的學生學習時間更長，⁷⁴因此儘管一九四一年有近千名的師範生，但一九四二年畢業的人數卻只有九十八人。⁷⁵影響師資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師範生被挪作他用。以「邊區師範」為例，在一九四〇年八月時該校有學生二百八十人，但中途抽調出去工作或轉學的卻有一百零五人，⁷⁶流動的情況相當嚴重。師範學生被挪用的情形不僅是在師範學校在學時期，更多可能是在畢業分派工作之後。由於各地方缺乏有能力的幹部，識字的師範生在分派各地之後往往被調用成為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些擔任縣三科科長、科員或是區教育助理員，還算是在教育工作範圍之內，但更多卻是擔任無關教育的工作，也因此教育廳曾經多次向邊區政府反映，要求禁止地方政府將教育人員任意調用，但是效果似乎不大。⁷⁷據一九四一年底教育廳對邊區十六個縣 897 個教員的調查，當中服務年資超過二年以上只佔全部教員的四成，⁷⁸換言之，有六成的教員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後才就職。邊區小學校從一九三九年春以後便已經接近發展停滯的狀態，教員的總數並沒有明顯增加，因此一九三九年以

⁷³魯迅師範與關中師範的相關敘述見，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二卷，頁 318-320；及〈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4。

⁷⁴〈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2-213。

⁷⁵〈陝甘寧邊區近五年來教育工作概述〉，《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366。

⁷⁶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二卷，頁 319。

⁷⁷見〈陝甘寧邊區政府訓令—各級教育幹部不得任意調動〉，《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二輯，頁 3；及〈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不得任意強調教育幹部充任其它工作的命令〉，《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六輯，頁 202。

⁷⁸〈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41。

後加入的六成教員顯然只是在填補流失教員的數目，這說明了教員被挪用情形的嚴重。

師範教育無法提供足夠的師資，於是大部分的教員便由當地縣政府動員。地方所動員的教員由地方舉薦，經縣政府施以短期訓練後派任，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邊區小學畢業學生，一是邊區政府口中的「老先生」，也就是過去的私塾教師。在教育廳眼中，做為小學教員，邊區小學畢業生在政治素質上沒有問題，但是在文化水準上十分不足；塾師正好相反，文化素質較佳，但卻是舊文化的產物，有「政治落伍」的疑慮。這兩種師資在教育廳的眼中都不符合要求，但卻是邊區小學教員的主力，因此只得透過許多的在職訓練方案來提升或改造。早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蘇區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四個月後，當時的中央教育部便在瓦窯堡辦了小學教師寒假訓練班，召集蘇區九十多名教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訓練，學習《共產黨宣言》和瓦窯堡會議的決議。⁷⁹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後，利用暑假或寒假辦理教員訓練班成為每年的例行工作。這些訓練班大多由各縣或各分區集中舉行，教育廳派員前往指導，學習時間為二至三週，內容有國防教育，統一戰線，教學法，游擊戰術，社會教育，小學組織，唱歌，體育等課程。⁸⁰

社會教育的師資方面，冬學學制的設計使得小學教師兼任冬學教師十分困難，因此冬學教員一般必需另行規畫。一開始教育廳的作法是調派中學或師範學校學生來支援，一九三七年第一次大規模冬學運動開展時，教育廳便支援了三分之二的冬學教員，但以後學生支援人數逐年下降，一九三八年剩五分之一，一九三九年六分之一，一九四〇年以後便不再有學生支援，⁸¹地方動員的知識分子又成為冬學師資的主要來源。在擴大小學的排擠之下，冬學所能得到的教員水準自然不高，雖然從一九三九年以後開始有了例行的冬

⁷⁹ 皇甫東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頁 112。

⁸⁰ 〈成績卓著—各地寒假小學教師訓練班〉，《新中華報》，1938 年 4 月 15 日。

⁸¹ 〈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通令—冬學初步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廳第二十號通令關於一九三九年冬學問題〉，《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24、37。〈一九四〇年冬學工作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社會教育部分(下)，154 頁

學教員訓練班，但是訓練只有十天，⁸²效果可想而知。爲了解決冬學教員的問題，教育廳決定從一九四〇年開始在各個師範學校中附設「社會教育人員訓練班」，由各縣選派學生，訓練時間六個月。⁸³原訂舉辦兩期，但後來只辦了一期；第一期計畫收學生 225 人，但結果只到了 100 人，⁸⁴成效顯然不佳。一九四一年爲了該年大規模推行新文字冬學，教育廳在 12 個縣設新文字冬學教員訓練班，訓練時間三個月，共有 430 名學員畢業。⁸⁵在當時各項開支一片緊縮聲中，如此大規模的冬學教員訓練措施令人印象深刻。

夜校、半日校或識字組均以小學附設或由小學領導爲原則，理論上師資不成問題，但如前面提到的，邊區小學大多只有一名教員，一個人要同時負擔這麼多的工作確實有其困難，於是「小先生」便成爲一個重要的輔助方式。「小先生」的構想最早是由陶行知在一九三四年所提出，主要的作法是挑選程度較佳的學生加以訓練，在教員督導和考核之下，不限時間、地點和對象進行「即知即傳人」、「學會一字是一字，教會一事是一事」的簡單教學。⁸⁶陶行知「小先生」的教學性質類似邊區的識字組教學，不過在陝甘寧邊區小先生的運用更加廣泛，不僅領導識字組，作爲半日校或夜校教員助手，有些甚至直接負責夜校或半日校的教學工作，尤其是半日校，因爲與小學同在白天上課，在教員無法兼顧的情況下許多都是由小先生負責。

在教員缺乏的情況下，推廣「小先生制」是一個極富創意的補救方式，只不過小先生畢竟只是小學生，「稍字條」、拿「識字牌」教人識字和簡單的宣傳工作或許還能勝任，要他們負責正式的教學工作實在力有未逮。再者，像識字組這種彈性極大，又深入社會底層的制度推廣需要教員、學生和民衆

⁸²〈陝甘寧邊區教育廳第二十號通令關於一九三九年冬學問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 37。

⁸³邊區教育廳，〈關於各師範學校附設社教人員訓練班事項的訓令〉，《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1940 年 4 月 25 日)，全宗號 10，卷號 463。

⁸⁴〈邊區教育現狀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20。

⁸⁵邊區教育廳，〈一九四一年新文字冬學教員訓練班工作總結〉，(日期不詳)，《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53。

⁸⁶余子俠，《陶行知》(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277。

的熱情配合，如果沒有強烈的自發動機或是嚴格的外力督促，要達到理想效果並不容易。從實際的情形來看，夜校、半日校和識字組也確實是邊區各種教育中運作最不正常、效果最差的教育方式。一九四〇年上學期延長縣三科的統計有夜校 41 處，半日校 30 處，識字組 287 個，但在下學期教育廳輔導團實地視察後發現，實際上運作的只有夜校 7 處、半日校 9 處、識字組 13 個。⁸⁷這種名不副實的情形在其它地方顯然也是常態，許多縣分呈送的報告中對於這些社會教育措施效果不佳、陷於停頓的情形根本是坦承不諱，教員的缺乏和能力不足則是常被提出的理由。前面提到的一九四〇年「社會教育人員訓練班」有學員 100 名，依教育廳的規畫，這些學員在辦完該年的冬學之後將成爲夜校和半日校的教員，但是後來並無下文，夜校和半日校的師資問題一直未能得到解決。

小先生的能力不足，不過正式教員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邊區的小學教員中有七成五是小學以下學歷，冬學教員沒有統計，但一般學歷顯然只會在小學教員之下。雖然這些教員在分派之前一般都會在縣政府先行訓練，但大多數訓練時間多只有十天到三週，有些甚至未經任何訓練，其能力可想而知。理論上師範畢業生的程度會好一些，但實際未必盡然。以魯迅師範爲例，一九三八年以前招收的學生大多來自機關部隊中的勤務、伙馬夫、退伍紅軍、紅軍家屬和「殘廢」，絕大部分其實本是文盲。⁸⁸一九三八年以後，招收的學生多是外來具小學學歷的青年學生，文化水準稍高，但只接受三個月到半年的不完整訓練，在教育廳眼中與小學畢業生的程度相差不多。⁸⁹

邊區教員的學識和能力一向爲人所詬病，識字不多是最常見的批評，許多教員文章不通，報紙看不懂，白字別字普遍，以致於被譏爲「文盲教師」，當中尤其是地方動員的小學畢業生情況特別嚴重。除了識字不多外，缺乏「現

⁸⁷ 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年 12 月 28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⁸⁸ 〈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2。

⁸⁹ 〈邊區教育現狀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12。

代普通常識」也是一個問題，尤其是「老先生」面對新式教科書中的白話詞句、政治名詞和現代事物無異於半文盲，「北洋軍」解釋成「洋鬼子從北方打來」，「熱河」、「察哈爾」不知是省或村，「遼寧」不知是什麼地方，「邊區政府」和「國民政府」分不清，「陝甘寧邊區」不知如何解釋。基本的識字和常識有問題，面對其它課目時就更顯得束手無策。一九四一年曲子縣調查有三分之一的學校教員不會教算術；有些教員加減法不懂，就連阿拉伯數字記位也不會，填寫年齡調查時，25 歲寫成「205」歲，48 歲寫成「40 八」歲；至於美術、唱歌、體育等科目，在教員不懂，又沒有教科書的情形下，大多數學校根本無法進行教學。⁹⁰

基本學識可能因個別教員而有差異，專業能力不足的情形則是普遍的情形。在「正規化」的過程中，教育廳要求教員要用「啓發式」的教學方法，要用民主方式來進行課堂管理，不同年齡和程度的學童要分級作「複式教學」。但在學識不足又缺乏專業訓練的情形下，大多數邊區教員的教學情況並不理想。教育廳將當時邊區的教學歸類為三種型態，第一類是「私塾式的教學」，教員是來自地方的小學畢業生或老先生，教學活動主要是將學生集合一起念書、背書，管教方法則是打罵體罰；第二類是「正規的舊式教學」，主要是綏德、隴東等過去新式教育較有基礎地區，教員文化程度較高，學校運作也正常，但是卻有「黨化教育」的殘餘；第三類是「尚未成形的新式教學」，教員多是邊區師範學校出身，懂得進步的口號，但卻缺少教育的知識和方法，能和學生打成一片，但教育效果卻不佳。⁹¹邊區大部分地方的教學是第一類

⁹⁰關於小學教員質量的描述相當零散，比較重要的可參看，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年 12 月 28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溫濟澤，〈怎樣改進邊區的小學教育〉，《新中華報》，1940 年 9 月 22 日；丁浩川，〈提高小學教員質量〉，《新中華報》，1940 年 11 月 7 日；凌菱，〈談談黨對於鄉村小學教員的領導〉，《解放日報》，1942 年 6 月 4、5 日。

⁹¹〈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42-43；關於小學教學情形的描述還可以參看〈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小學教育總結〉，《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49；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年 12 月 28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和第三類，前者是中共認為應該淘汰的教學方式，後者卻是效果不佳的教學，於是大部分小學不是整日朗讀背誦，各唸各的書，就是教員帶著學生四處亂跑。這樣的教學在小學也許還能勉強進行，但是在面對成人為主的社會教育時就行不通了，尤其許多教員都只是小學剛畢業的「娃娃教員」，學識不高，無專業訓練又沒有社會經驗，教學效果不佳，在民眾面前「毫無威信可言」。

92

對於這樣的情形，教員們在飽受批評之餘也有著滿腹的委曲。一九四二年在《解放日報》上有一篇署名「振翼」的投書，作者自稱當過三年的教員，一開頭便說「大概只有思想不健康的人才會做這工作」。文章中他自嘲為「坐在深溝窯洞裏的腐秀才」，教學既無參考用書，又無其它材料可用，於是學生對他的教學不滿，連首長、幹部、戰士也批評「教員教員，光會吹牛，賣狗皮膏藥的」。他抱怨：「人們都說教員質量不好，誰知道「馬兒沒吃草」呢？」。學生、幹部都瞧不起教員，認為教員的能力差，但對教員的要求卻又超乎一般人，除了教學工作之外，要領導學校生產活動，要起模範作用上山背柴，還要「幫廚」；學校活動之外，平日要參與地方事務和動員工作，俱樂部主任、青年隊長、自衛軍訓練都少不了教員的一份工作。工作吃力又不討好，連地位都低人一等，平日只能面對伙馬伕、老頭子、調皮「小鬼」，連低級幹部都可以指揮教員，在別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工作時還會覺得「侷促、內愧」。⁹³

從文章來看，這位署名「振翼」的教員文化水準不低，從他提到每兩三個月會有政府官員如楊尚昆等人到校演講一事來看，應是延安附近中等學校以上的教員，如果他尚且覺得委曲無助，農村地區教員的處境就更加艱難了。農村教員學識更低，資源更少，但工作負擔卻更重。依照教育廳的規畫，小學教員白天要教小學、半日校，晚上要教夜校，要訓練「小先生」領導識字組，在冬學期間還要協助經驗不足的冬學教員；教學工作之外，要種地開荒，學校缺伙夫要幫學生燒飯，要協助各種宣傳活動，參加徵糧動員，就連寒暑

⁹²見，延川縣，〈歷年的冬學總結〉，（1943年5月27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61。

⁹³振翼，〈一個政治教員的呼聲〉，《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日。

假都得要下鄉去作社教、優抗、除奸等群眾工作，⁹⁴比之「振翼」的工作又要繁雜許多。工作負擔更重，但地位又更低。當時百姓有諺語說：「種麥子不如種黑豆，作教員不如當吹手」。⁹⁵「黑豆」本是餵馬的下等雜糧，「吹手」則是地位不高的民間樂手。在土地貧脊、氣候惡劣的陝北，小麥種植不易，收益不見得比種黑豆好；而教員傳統上雖然有著「經師」、「人師」的美名，但在當地人們的眼中卻可能連吹手的地位都比不上。

更讓教員難過的可能是生活待遇不穩定。依規定教員待遇比照政府工作人員，除了每月的糧食和津貼外，還有每年的服裝、鞋襪供給，⁹⁶但由於各地教育經費多由縣內經費開支，因此實際上的待遇因各縣情況有所不同，例如教員津貼在某些縣分根本不發，⁹⁷又由於大部分的教員供給都是直接在當地「發動群眾解決」，因此即使在同一縣內也可能因地方而有所差異。「群眾解決」要學生家長供應教員米糧、柴火、油、鹽等生活所需，有的讓教員與住校生一同開伙，有些則是乾脆讓教員到學生家「寄食」；至於服裝、鞋襪則是由地方幹部動員民眾製作。⁹⁸對於農村地區來說當地動員、當地解決是一個最簡單方便的方式，但這樣的方式等於是要求民眾來「供養」教員，在教員地位低落、教學能力不受信任的情況下，民眾額外支出「供養」教員的意願顯然不會太高。

民眾「供養」的意願不高，教員生活待遇的好壞便取決於地方幹部的關心與否。地方行政組織中有各級的教育專職單位和幹部，在縣有三科，在區

⁹⁴相關資料主要來自，振翼，〈一個政治教員的呼聲〉，《解放日報》，1942年3月26日；定邊縣〈關於識字組檢閱經過小學放假及假內工作佈置的報告〉，（1940年2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35；柯柏年，〈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初等教育部分(下)，頁252-253。

⁹⁵延長縣，〈一九四二年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年2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175。

⁹⁶〈陝甘寧邊區各縣教育經費開支暫行標準〉，《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287-289。

⁹⁷延長縣〈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1年2月8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10，卷號35。

⁹⁸見〈今後學校教育總方針〉、〈邊區教育現狀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114、130。

有「教育助理員」，在鄉有「文化主任」。依規定，這些幹部必需主動到各地方巡視，一方面是督促學校正常運作，一方面也是幫學校、教員解決問題，只不過這些幹部經常被批評「工作不力」，對於地方教育的問題少有關照。地方幹部不關心教育，一方面固然與個人的勤惰態度有關，但許多時候卻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他們經常必需協助各種地方動員工作，徵糧、擴兵、運鹽、推銷公債、選舉登記等幾乎是無事不與，尤其在一九四一年邊區經濟情況惡化之後，各種動員工作更是佔去了教育幹部大部分的人力和時間。以各縣三科為例，教育廳在檢討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教育工作時用「縣上工作一把抓」來形容三科的工作情況。「延川春耕一個月，推銷公債二十天，借糧、運鹽三科全動員，月餘未結束；…關中各縣十分之七做其它工作，計參加買糧一月，選舉登記一月，擴大青年營一月，借糧一月…。」更有三科長因為下鄉動員，竟然不知道教育廳通知要開三科長會議，⁹⁹根本是將本職的工作擱置一旁。除了雜務多，三科也經常處於人力不足的狀態，以延長縣三科為例，在一九四一年一整年中，有人受訓，有人調職，有人生病，有人請假，很多時候根本無人在崗位上，大部分時間則只有一人坐鎮，動員工作一來，教育工作便完全停擺。¹⁰⁰

三科如此，其它教育工作人員也是如此，忙於各種動員工作，分內的本職教育工作反倒成了動員空檔的「兼差」，邊區政府從一九三八年四月以來所積極建立的教育行政系統在這個時候幾乎已經失去原有功能，地方教育所倚靠的除了教員之外，就只有個別幹部的熱情了。在這些幹部中，直接負責教員生活動員的是「鄉文化主任」，但是在雜務多，缺乏縣、區督促，又是不脫產幹部的情況下，鄉文化主任並沒有太多的心思來幫助教員，「不合作」、「不負責」，找不到人願意擔任，「精兵簡政」以後甚至被取消，¹⁰¹於是教員就只

⁹⁹〈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21-22。

¹⁰⁰延長縣，〈一九四一年上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1 年 8 月 20 日）、〈一九四一年下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2 年 3 月 9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6。

¹⁰¹郭林，〈怎樣使學校和群眾的關係密切起來〉，《解放日報》，1942 年 5 月 6 日。區教育助

能自求多福了。一般來說，本地出身的教員因為地緣關係，較容易得到民眾的幫助，即使供給動員不順利，家中也還有田產收益，生計較不成問題。至於外地來教員，大多是邊區政府分派下來的師範生，政府所規定的供給是他當下唯一的收入，如果群眾關係沒打好，工作表現不佳，要民眾心甘情願的「供養」恐怕就不太容易了，因此「不夠吃」，「衣被缺乏」，糧食經常收不齊，以致於教員還得親自到民眾家中「斂糧」。¹⁰²在這種情況之下教員一職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差事。被動員當教員的人想盡辦法推拖，推拖不成有些人乾脆拒不上任；勉強當上教員的則是工作情緒低落，「開學不上課」、「隨便回家」、「打學生，不教書」；有些則是心不在焉，忙著趕集、作生意，還有人因為「家中代耕不頂事」老想回家種田。¹⁰³

五、 學生動員

設備、教材不足，師資不良，這些都是邊區教育發展的困難，不過最大的問題可能是民眾根本不想上學。在邊區動員上學顯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民眾逃避就學的方式無奇不有：雇人頂替、逃跑、裝病，女的「裝大肚」、未成年出嫁，反應較激烈的地方甚至還有人跳崖，以死相拒，以致於就學動員必需要靠罰金、拘捕家長或自衛軍「拉綁」才能完成。¹⁰⁴不願上學的原因有很多，前面提到各方條件不良，學校教學效果不佳是原因之一；過去學者們也提到教育內容政治意識濃厚，民眾沒興趣，¹⁰⁵不過光是「沒興趣」一由實在很難解釋「跳崖」、「自衛軍拉綁」這些激烈的抗拒行爲。

群眾拒絕上學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對新式教育的不信任。如同許多初次接

理員同樣在「精兵簡政」之後取消。

¹⁰² 〈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43。

¹⁰³ 見延川縣，〈冬學初次檢查報告〉，(?年 12 月 5 日)、延長縣，〈九月份教育工作報告〉，(1938 年 10 月 6 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60、33。

¹⁰⁴ 〈邊區教育現狀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10；

¹⁰⁵ Peter J. Seybolt, "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48(Oct.-Dec. 1971), pp.649-50。

觸新式教育的地方一樣，傳統觀念的影響造成女子就學動員困難，加上民眾普遍對於學校「講女權」、「講自由」有所戒心，怕女子上學後「變開放」、「鬧離婚」，¹⁰⁶女子就學動員的困難有其特殊原因。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抗拒就學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經濟上的負擔。對農村家庭而言，即使是兒童都算是半個勞動力，上學受教育不僅是減少了家庭中的生產人力，更要額外負擔上學所需文具、生活費用、學校費用等支出，等於是雙重的「經濟剝削」。如果說上學就是讀書識字的話，農民也許還比較能夠釋懷，但學校教學效果不佳不說，許多時間是花在學校生產、「放哨」、幫教員「拾柴」，以及宣傳、「抓煙燈」、「優抗」、「優工」等社會工作。¹⁰⁷丟下自家的生產工作卻去幫政府做其它雜事，如果識了字、畢了業又可能會被政府徵用成爲「公家人」，¹⁰⁸這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力役」。

對於成人而言，學校剝削人力的感受可能更加深刻，尤其是必需離開家庭和脫離生產工作的冬學教育。雖說冬學設計已經考慮到農村生產的需要，將就學時間訂在農閑的冬季，但實際上冬學開學之初往往秋收尚未結束，有些時候冬學尚未結束，春耕已經開始，更何況傳統陝北地區農民往往會利用冬季進行手工生產或外出攬工、當腳夫補貼家用，並不如中共官員想像中的閑暇。¹⁰⁹上學佔用生產人力的影響在一九四〇年以後更爲明顯，救國公糧一年比一年增加，動員工作日益頻繁，政府還要求開荒增產，有些人家已經送了子弟「擴兵」入伍，在這個時候還要抽調有限的人力去上學，對於民眾而言不僅是「擾民」，甚至是影響了生計，難怪民眾不願上學。

上學不受歡迎，如果再加上動員方式不當，民眾自然會有激烈的反應。一般來說地方動員學生是採「攤派」的方式，邊區政府規定各縣校數、人數，各縣將數目往區、鄉分配，實際負責動員工作的責任便落到了地方幹部身上。

¹⁰⁶ 煥南，〈記一女教員同志談話〉，《解放日報》，1942年9月20日

¹⁰⁷ 「抓煙燈」是舉發吸食鴉片的反毒工作；「優抗」、「優工」則是爲抗日人員或政府工作人員家屬所進行的力役服務，一般小學生所進行的是拾柴、打水之類的簡單工作。

¹⁰⁸ 「公家人」是指政府的工作人員。

¹⁰⁹ 秦燕，《清末民初的陝北社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15。

地方幹部包括鄉政府人員、文化主任和自衛軍、青救會、婦聯會等民間團體幹部，必需在開學前開會分配、決定動員上學的名單。依規定，地方決定動員名單時需考慮動員對象的狀況，包括年齡是否適合，身心是否健全，家庭貧富、勞動力狀態是否能負擔上學，以及學校路程遠近等，等名單決定後還需一一通知，並且解釋說服。如果真能這樣動員，民眾或許不致有激烈的反彈，但是多數地方幹部顯然並沒有這樣的心情和時間來仔細動員，往往是抄了名單便往上呈報，然後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民眾。來自縣、區的層層壓力下，地方幹部在動員過程中並沒太多的耐性，如有民眾不服便加以強迫、甚至處罰，加上地方幹部不免「耍私情」，不動員自家子弟，甚至包庇親戚朋友，¹¹⁰ 民眾的情緒可想而知。

面對政府的強制動員，自衛軍拉綁或是跳崖畢竟是比較極端的反應，一般民眾在命令、處罰的威脅之下也就出現了許多的「對策」。地方幹部的強力動員，說穿了也是為了應付上級的要求，只要動員對象家庭出人上學，幹部能交差了事，其它的問題幹部並不多管，也因此教育廳批評地方幹部是「不問呆子聾子，只要有了應名的數字，就算萬事大吉」。¹¹¹教育廳在巡視一九四一年的冬學中發現學生中竟有四歲幼童、老人和「眼病的」。¹¹²一九四二年教育廳巡視延長縣時也發現，某一個夜校中有一名學生竟然是教員的完小同學。¹¹³這種動員非人的情形在邊區各種學校中十分常見，有些是為了減少對家中生產人力的影響，因此乾脆將家中非勞動力人口通通送去應付動員；有些人家則是視上學為畏途，因此出錢雇請曾經上過學的人前往頂替，以致於某些上過學、識了字的民眾不斷被重複動員上學，簡直成了「職業學生」。

¹¹⁰ 〈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關於一九四二年冬學的指示〉，《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下)，頁46。

¹¹¹ 同上。

¹¹² 〈邊區教育廳總結新文字冬學工作〉，《解放日報》，1942年3月30日。

¹¹³ 延長縣，〈一九四二年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年2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卷號175。根據文件內容所示，這份報告完成的日期是1942年2月12日，內容中說明巡視時間從十一月開始，因此應該是一九四一年下學期的報告，檔案名稱「一九四二年下期」顯然有誤。

在諸多奇特的現象中，「以小換大」可能是影響較大的一種情形。所謂「以小換大」是指學生唸了一、二年後便輟學回家，由家中年齡較小的兒童前來頂替充數，目的方面是爲了讓年紀較大、勞動能力較佳的兒童回家照顧生產，一方面也是怕畢了業變成「公家人」。「以小換大」情形之嚴重造成邊區各地小學普遍出現低年級人數多，高年級人數少，而且人數相差懸殊的現象。以綏德一九四一年的初級小學人數爲例，一年級佔總數六成，二年級佔三成，三、四年級學生合起來竟然不到全部人數的一成，甚至有些學校辦了五、六年竟然不曾有初小的畢業生。再從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人數的比較上來看，一九四一年全邊區小學生總數有四萬三千人，但是當中高級小學人數卻只有二千人，¹¹⁴換句話說，即便在邊區教育發展最高峰的時候，每年的小學畢業生也可能只有幾百人，由此可知「以小換大」的嚴重影響。

總而言之，大規模的教育從一九四一年以後其實已經很難再維持下去。就拿上面提到的小學教育來說，在萬般艱難的環境下，費了許多心力，甚至不惜引發民怨所建立的小學教育，每年卻只能培養出數百名的小學畢業生，難怪《解放日報》社論大嘆：「錢花了，人忙了，數字一大堆，效果沒多少。」¹¹⁵小學教育動員困難，社會教育的動員自然更不用提，許多的地方報告都指出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的社會教育已經幾乎處於停頓的狀態，一九四二年以後教育廳不再公佈邊區各項社會教育人數顯然與此有關。以每年舉辦的冬學運動來說，冬學期間也正是各種動員工作高峰，秋收不說，每年最重要的徵糧工作也在這個時候展開，加上運鹽、挖工事、運送傷兵等臨時調派的工作，能夠撥空上學的人已經不多，更不用說是自願去上學。據估計，加上勞役負擔之後，當時邊區農民的負擔平均將近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¹¹⁶如果再加上學的花費和勞動力損失，這個數字恐怕還不只於此。對於邊區政府來說，在

¹¹⁴ 〈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與今後方針〉，《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24-26。綏德地區由於原爲國民黨統治區，因此學制畫分爲初小四年，高小二年，與原邊區學校初小三年，高小二年的學制有所不同。

¹¹⁵ 〈提高邊區國民教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4日。

¹¹⁶ 陳永發，〈內戰、毛澤東和土地革命—錯誤判斷還是政治謀略?〉(下)，《大陸雜誌》，92卷3期，頁 119。

這個時候收縮教育規模，「效果沒多少」也許還是次要的考量，大規模教育製造了地方幹部的負擔和民眾的怨懟，「善政」成了「虐政」，「教育」反倒成了「反教育」，或許也是邊區政府不得不放手的原因！